

什么样的城市最幸福?

2010年12月26日,由长沙始发的“幸福号”又在长沙进站。这一天,是毛泽东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正是在长沙橘子洲头,年轻的毛泽东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成为一代伟人登场亮相的定场诗,也饱含了他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索,数万万中国人的幸福之路究竟在何方?

117年后的今朝,中国(大陆)最具幸福城市颁奖晚会将在湖南大戏院“华彩唱风流”。历史车轮驶过百年,窗外移步换景,每一代人在追求着每一代人的幸福,每一代人都相信:下一站,幸福。21世纪头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一个新的十年刚刚扬帆起航,更帆易帜,发展主题由“富”到“福”。

白岩松说,中国正处在“折返点”上,折腾、反复、试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最终指向全民幸福。为幸福城市颁奖,不意味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哪怕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也总有不幸福的事在发生。寻找幸福的城,比寻找幸福的人要难得多。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需要一点给力的召唤,保持继续前行的动力。

为幸福城市颁奖,也不意味着找到了幸福模板。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里转移,难免粗糙。在反复试错中总结出的“哪些不幸福”或许是更宝贵的经验。于是,有了关于幸福城市的六个设问。

“大”,就是幸福吗?

2007迄今,由《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并主办的“中国(大陆)最具幸福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举办四年,首现一线城市身影。

广州首次入选,“北上广”俱乐部中,广州不是直辖市,但它的电话区号是三位,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三城”。重庆首次入选,它是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却不是中国的第四城。

调查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基本上在所有的指标上,上海、北京只有数次出现在前10的榜单上,而在二、三线城市中,生活节奏慢、工作压力较小、环境较好的城市往往在各种指标上都表现优异。

甚至一线城市该有的垄断性优势,也未在幸福感中体现。比如,医疗的便利程度和容量,2009年排名前三的北京、上海这次却爆冷跌出榜单,一方面是因为日益稀缺的名医资源,另一方面是患者越来越高的要求。

再如,教育方面,拥有众多高校的北京、上海都跌得很厉害,大城市中南京表现优秀,这显然与当地长期以来注重教育平衡发展的理念有很大关系。南京也是入围“最具教育幸福城市”城市。三线城市中,无锡拔得头筹,排名第二的是通化。综合来看,大城市的教育不公平引起部分群众不满是导致幸福缺失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看重家门口的中小学教育。

又如,赚钱机会,经济发达的上海,吸引众多外来务工者的深圳都不在名单上,一方面跟不断内迁的工厂提升内陆城市的工资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内陆城市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而且离家较近的工作更容易让人有认同感。

甚至购物便利性这个大城市作为“购物天堂”所该有的优势,也因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受访者往往将香港、东京等作为对比对象从而压低了得分。杭州既紧挨义乌等小商品城,又毗邻上海等高档商品聚集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成都由于其西部中心的地位,强调消费和休闲的文化吸引着众多商家的进驻。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世博、亚运等超大型国际活动确实对幸福感有助推作用。在生活总体幸福度排名一项,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刚刚举办世博会的上海的排名和2009年相比有很大上升,可见世博期间上海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环境等措施对于提高市

民的幸福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亚运会余温未消,使广州的表现超越了其他一线城市。在交通项,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均未入榜,广州名列季军,看来免费公交尽管人满为患,也不失为得民心的尝试。

有燥热无温情的大城市,普遍在人情味一项失分,人情味最浓的城市是通化、成都和杭州,上榜的城市大都生活节奏较慢。在生活节奏快的城市中,人们生活压力较大,大部分时间用来谋生计,缺乏人与人的沟通。

广州、重庆两座入选的大城市,在颁奖礼上的亮点恰恰是人情味。由市民为市长颁奖是颁奖礼的一大特色,重庆的颁奖者和领奖者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是全场唯一的拥抱;广州的颁奖者则身穿亚运会志愿者服,始终跷着大拇指,始终翘着嘴角微笑。

“小”,就是幸福吗?

从2009年起,最具幸福城市推选,首次将县级市纳入调查的范围。这是对小城市幸福权的等量齐观。同时,县级市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评价分别进行,这可视作公平,却是为了照顾现实中的不公平。在生活便捷程度等具体指标上,小城市仍无法望大城市之项背。

在中国城镇化即将驶入快车道之际,费孝通就提出大力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劳动力,“小城镇,大问题”的提法得到胡耀邦等人的强力支持。但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按费老设计的路径走。

做大做强的冲动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热血期很难抑制。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做大有做大的好处,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搭建城市这个平台很有必要,某种意义上,越大越好。

中国城市化倒是沿着费孝通提出的“从农村栽培出小城市”的路线在走。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中小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又是在乡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早已突破了半径100公里的“离土不离乡”的圈圈。“春运”、“回家过年”因此成为中国特有的劳动力流动景观。

本次调查也测了他们对下一代留在该城市的主观幸福感,也测了他们对于下一代留在该城市的意愿。“这山望着那山高”是中国式幸福观,永远觉得幸福在他处。于是,农村的田埂线向着城市的斑马线走,二线城市向着一线城市走,一线城市向着国际线之外走。

在中国,“X二代”是个血缘赋予的身份,做某座城市的二代,是地缘赋予的身份,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自主选择,并通过地缘上的重新选择,“优化血缘”。“凤凰男”奋斗了18年换来与城市女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机会,他的子女或许通过另一个18年的奋斗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咖啡。可是,当你生活的城市足够幸福,你还愿意离开吗?

在县级市中,市民最希望下一代留下来的,江苏江阴市以明显的优势夺得冠军。江苏宜兴、湖南长沙县、辽宁海城、重庆铜梁四个县级的差别极其微小,分列第二至第五位。这些都可视作幸福的小城。

然而,在最具幸福感的10个上榜城市中,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它们也不是散列的小城镇,“以大带小”十分普遍,无锡抛下江阴、宜兴一起荣登“幸福榜”,重庆



杭州市继续蝉联2010年中国(大陆)最具幸福城市榜首。

领跑“唱红打黑”,长沙市与长沙县手牵手。

摊开中国地图,幸福城市主要是沿长江一线布局,而后再在江浙一带上拐,形成一道“幸福之拐”,然而,“拐型”结构是不稳定的,如果横三纵四多出几条边,中国的疆域图会有更稳定感。况且,幸福线向中西部腹地的延伸,主要还是靠成都、长沙、重庆等大城市,作为拥有最多县域经济的广袤腹地,小城之“小”并不是幸福的理由。

“全”,就是幸福吗?

所有幸福感调查的难题都是处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本次调查采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

一种方法是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衡量,即分别测量与城市总体满意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分值,比如经济、人文、环境、交通等,然后按照特定的权重体系对各因素的分值加权平均后得出最后的总体综合指数。这种方式看似客观,实则主观。原因在于:人们很难通过客观方式为各种不同的因素分配权重。

另一种方式是直接问受访居民对其生活的总体主观感受,“当您想到您的生活时,开心程度是几”。这种方式看似主观,实则客观。因为幸福本来就是一种感觉。

于是,探究生活总体幸福度和城市具体幸福度之间的关系成为本调查的一个重要任务,并且,还必须找出哪些城市具体幸福度与总体幸福度的关系最密切,是人情味、交通状况,抑或是房屋价格?

结果表明: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1个幸福因子≠总体幸福。大而全的城市不一定是幸福的城市。

比如,居民对其城市城区建设幸福度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依旧看不到一线城市北、上、深的影子,虽然这些城市的硬件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主要是因为人们不再把城区建设等同于简单的硬件建设,而更多地关注这些设施的应用和亲民程度。

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加关注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市民文明程度、教育质量和污染程度这些因素对自身幸福度的影响。同时,随着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个城市的文体设施建设、城区建设和

购物便利性也极大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总体幸福度。房价,更是必须考虑在内的重要因素。

县级市的经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可能人们尚不习惯工作压力变大的生活,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也较大地影响着居民的幸福度。此外,县级市医疗卫生条件极大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幸福度。

无论是在地级市还是县级市,人情味、购物便利性、污染程度、物价、教育质量都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度的主要因素。

“专”,就是幸福吗?

与“全”相对的,是“专”。

一线城市是综合型的,二线城市是专业型的,二线之下的,有时连“西门庆故里”这样偏门的专业资源也要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格局决定这座城市所享受的资源。但是,有些资源属于天赋,资源型城市是专业型城市中天后人妒的一类。

中国共有118座资源型城市,约占城市总数的1/6。同时,入选最具幸福感候选城市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和60座县级市,总数120,也占中国城市总数的1/6。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1/6的交集,竟然只有一座城市——莱州,最终当选。

莱州在资源型城市中也属于少数派。资源型城市多以煤炭、石油、铁矿、铜矿产业为主,其中煤炭城市占53%,而莱州的资源是石材,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北京、上海、深圳国际机场等大工程,都有莱州石材镶嵌其中。

资源城市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导致其在环境项上失分。环境幸福度排名前20位的等级及以上城市,往往和城市所拥有的自然禀赋高度相关,且大部分为南方城市。而中国约80%的资源型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片地理分布带上的不重合,正可解释上述两个1/6为什么不重合。

而在城市污染程度幸福度排名前20位的等级及以上城市中,昆明由于制造业不发达以及大量的绿化面积拔得头筹,紧接着的重庆、杭州等城市也都不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充分体现了高污染制造业对人们幸福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目前有矿业城镇420多座,多数是由国家通过重点项目的集中投资而发展起来的,

代表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资源枯竭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普遍面临转型难题。

“富”,就是幸福吗?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对煤炭等能源的高需求,及经济转型难以立时调头的强大惯性,仍造就出鄂尔多斯式的暴富神话。

“羊煤土气”使得这座西部三线城市扬眉吐气。人均GDP超过上海和北京,接近15000美元,一跃成为中国大陆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下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要在5年内人均GDP赶超香港,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城市。鄂尔多斯的车牌号在内蒙古的排序是“蒙K”,当地人戏称为“猛开”。

这个富得只剩钱的城市,是研究财富与幸福感关系的极好样本。在入选的6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鄂尔多斯居第55位。但在20项具体幸福度调查中,无一项目进入前20强。

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追求经济发展,企业追求经济回报,个人追求经济地位,但是经济就真的是一切的终极目的吗?历次调查结果都显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度,可人们的幸福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中大部分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时,发展经济能显著提高国民幸福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与幸福的关系会减弱,并且在一些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反而带来幸福水平的下降。

经济作为幸福的第一助推器,即将完成星箭分离,中国需要另一节助推火箭。

从GDP到GNH(国民幸福总值)是越来越大的共识,并正通过“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意志。当然,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是硬指标;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地位和作用。

对幸福感的另一挑战是“均贫富”。本调查中未将贫富差距作为影响幸福感的指数考察,其他机构的研究显示,居民不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两极分化。但是,这次推选活动将民生列为重点的调查指标,并授予了杭州、成都民生贡献特别大奖。“民生”是政府所能做的、合法合情合心的、最好的均贫富工作。

“穷”,就是幸福吗?

“福”字与“富”共享同一偏旁,“穷”字与“福”却是无缘。

百强县是县级市入选最具幸福城市的人场秀。调查结果显示,上榜的县级市几乎被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经济强县所垄断。这些城市都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市中名列前茅的县市,较好的经济发展为县级市带来的幸福感还较地级及以上市高。

不丹是一个贫穷仍能幸福的小国样本。40年前将GNH列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时,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近几年来为发展经济,不丹可能不得不牺牲他们可以引为傲的国民幸福指数。近半的国家预算靠外援,23%预算由印度提供,这令不丹政府非常不安。

六个设问,只给出了什么是不幸福,因为幸福不会千篇一律。幸福的确很难,大不幸福,小不幸福,太富有了太富有的不幸,穷有穷的不幸。

什么是中国人理想中的幸福城?从成都、杭州、昆明、长沙、长春这几个幸福感胜城市可窥一斑。它们经济发达而不饱和、好山好水而不寂寞、步履从容而不急躁、自顾享乐闻名天下却不失对外来者的包容,一切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也许,享受中庸即是幸福。据《瞭望东方周刊》

新闻时评

太会做官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他开始充满好奇的交流愿望被一种厌恶情绪所替代,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会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不以为然,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实践精神。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他说,中国需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我觉得,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个大毛病。直到今天,“坐而论道”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根深蒂固,它们似乎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一位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就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主要指知识分子)之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际,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至我们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

我以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真正进行反省的时期。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曾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功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功夫”;王国维、陈寅恪也一再讲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都有这层意思。这个特点与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中国特色。

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世俗地位的筹码。前些年,我国有关机构曾对城市居民做了一次关于“最喜欢的职业”的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最喜欢的职业是“做官”。如果今天看看这个调查,结果如何或许只要看看考公务员的规模就知道了。我以为,干某件事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件事本身,而在另外某件事上,如结婚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钱,那就叫世俗。而生命的本质在于,干某件事的目的就是这件事本身……而今天,我们都以问自己,我们选择某一个职业,做某件事情,是因为爱而选择它吗?

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说得透彻。他指出:太会做官是中国人的大毛病。研究学问是一件事,做官又是一件事。理论与实践最好不必统一,做官的如果认真起来,一定要把研究的学问(科学的真理)付诸现实,则不免有点傻气,马寅初便是这样的“傻官”。相比之下,“坐而论道”容易得多,你可以天马行空,无需用实践证明它的正确与否。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何以可能产生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知行何以能够统一?

当一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年轻人把做官看做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时,不免让人忧虑。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职业化,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术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 柳延廷



“常回家看看”不能靠法律强制

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表示:“由于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因此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但以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以前这种诉讼法院一般不会受理,但现在法院要立案审理。”(1月5日《山东商报》)

多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风行大江南北,唱得游子纠结而黯然,唱得空巢老人凄婉而喟叹。百善孝为先,常回家看看,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与父母唠唠嗑,是表达孝意的基本方式,也是朴素而必需的人之常情。联系到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由于无人照料而发生不少悲剧,孩子就更应该多探望父母,甚至与父母住在一起。再联系到确有不肖子女,不愿意看望父母,由是观之,新老老年法拟定了子女要经常看望老人,其初衷良好,释放了浓浓的善意,但是,笔者认为,对此不宜激赏,尚需理清三点疑问:

其一,子女是不愿意常回家看看,还是不能常回家看看?随着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古代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思维已经飘落在风中,我们是不折不扣的“飘一代”。不少子女不是不想常回家看看,而是无法常回家看看,一是路途遥远,二是假期稀少。有网友说,法律应该先强制公司执行带薪休假制,更理想的是,城市房价能够降一点,让做子女的买得起大房子,把父母接到城市里住。

其二,如何界定“经常”,换言之如何操作?一个月回家一次是经常,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也是经常,半年回家一次算不算经常?再说,即便子女不常回家看看,父母是不是就会怒而付诸法律?强求而来的亲情是脆弱的,也是没有根基的,当父母和孩子撕破了脸皮,慑于法律威力,子女即便常回家看看了,但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又有何意义?

其三,法律该不该过度介入道德范畴?常不常回家,与伦理、道德有关,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道德法律化不妥,法律道德化同样不妥。如果法律过于侵蚀伦理或干涉道德,只会适得其反,最终导致法律不被遵守,削弱了法律的效力。

其实,法律规定子女要经常看望老人的背后,隐含着一个错位的命题。在不少人看来,赡养老人是子女的责任,殊不知,养老、敬老、爱老,不只是子女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当仁不让地强化养老保障,让老人有尊严地安度晚年,这比法律迫使子女常回家看看有必要。 王石川

赢在起跑线上

“婴儿什么都不懂,他小脑袋空空的时候,是最佳、最重要也是最好教育的时期,可惜被一些父母懵懵懂懂地错过了。”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宏开呼吁,为人父母者应加强对孩子的成长科学的认知,避免家庭早期教育出现重玩轻育、重养轻教、重智轻德等种种误区。 焦海洋/图

被骗的女副市长何以引舆论倒戈

一男子自称是北京一家装饰公司的设计总监,先后通过谈恋爱、许诺结婚等方式骗取一女副市长286万余元。近日,嫌犯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宣判后,被告人表示要上诉。(《北京晨报》1月5日)

这则新闻颇有些令人“意味深长”的味道。一方面在于,新闻中充斥着“某地级市副市长”之类的表述,新闻事件给人的第一感觉不像是新闻而更像是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而另一方面在于,被騙财骗色的女副市长原本是利益受到侵犯的弱者,但却引起了舆论的一致倒戈。关于“女副市长的286万从何而来”的质疑和拷问,在网上似潮水一般。

实事求是地讲,因为被騙286万就对新闻中的“女副市长”进行有罪推定,显然有失公允。这里,与其说舆论执著于“一个女副市长家产”的探究,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起事件无意中引发了公共社会对于官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渴盼情绪——人们希望了解官员的收入财产信息,与“仇富”无关,与监督权和知情权有关。“这个女副市长为什么这么有钱”的追问,不过是强大公共监督欲望的一次释放罢了。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

为是反腐败的终端机制,但至今未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纵然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功推行了,这位“女副市长”的钱从哪里来,仍然还会是一笔糊涂账。读完这篇报道,我们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任何质疑或者拷问的板子落下来其实都成了鸡毛掸子。

经常会读到此类的新闻,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只要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功推行了,这位“女副市长”的钱从哪里来,仍然还会是一笔糊涂账。读完这篇报道,我们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任何质疑或者拷问的板子落下来其实都成了鸡毛掸子。

经常会上读到此类的新闻,不管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只要是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功推行了,这位“女副市长”的钱从哪里来,仍然还会是一笔糊涂账。读完这篇报道,我们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任何质疑或者拷问的板子落下来其实都成了鸡毛掸子。

一个女副市长与骗子的恋爱故事,如是的“女副市长被騙案”越看越像花边绯闻,除了招徕窥私猎奇的眼球和无聊的口水争辩之外,其实没有任何价值。由此,也就难怪网民对受到伤害的女副市长进行舆论倒戈了。 陈一舟